

## 【备课参考】

# 王安石的论证失范与思维偏颇

## ——《答司马谏议书》的批判性阅读

宗学耀

**【摘要】**《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经典驳论文,有颇多值得学习借鉴之处。但以质疑和审慎的态度阅读时,会发现王安石在论证技法和思维品质上是有问题的,比如概念模糊含混、批驳的针对性和目标性不强、作者缺少公正开放的思维品质和以自我为中心等。正视这些问题,有助于客观认识其人其文。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论证针对性;概念明晰;说服力写作

《教师教学用书》的“课文解说”栏目这样评价《答司马谏议书》(以下简称《答文》)一文:“这篇书信,篇章短小精悍,语气委婉而严正;不涉私人意气,也不屈从反对意见。立论和批驳结合,举例论证和道理论证结合,当下和历史结合,排比和反问结合。结构严谨,层次清晰,是驳论型政论文的典范之作。”<sup>[1]</sup>

从上述文字来看,《答文》似乎完美无缺,无可指摘。但我们摆脱对王安石和《教师教学用书》编者等权威的迷信和盲从,细读本文,并参读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等,就会发现这篇文章从论证语言的运用到论证方式的选择再到作者本人的思维品质,都存在不足之处。

### 一、思维的起点:概念要清晰,避免语言模糊,论证迷雾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也是思维的起点,是构成判断和论证的最基本要素。概念内涵不清晰,外延不明确,就会导致思维模糊混乱。正如董毓所说:“如果在一个论证中,它的关键词语是模糊的,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的意义和运用范围,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它会把论证带到迷雾中。”<sup>[2]</sup>《答文》论证失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中诸多概念模糊,如“朝廷”“有司”“先王”“邪说”“壬人”“众”等。这些概念看似具体,实则抽象,指称对象作者自己可能清楚,而读者不甚明了;或者站在不同角度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不相同。

如:“先王”的外延到底指什么?“先王之政”具体指什么?王安石的语言高度凝练概括,但这造成了意义的不确定和理解的障碍。这种状况也可从司马光的《与王介甫第三书》中得到证实:“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賒贷之事乎?”<sup>[3]</sup>司马光猜测“先王之政”的具体内涵还有一处:“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sup>[4]</sup>前句中的“泉府賒贷”是指周朝的一项国家货币借贷政策;后句是指汉武帝时桑弘羊进行的国家资本财政改革。从司马

光的两种猜测来看,王安石“先王”的措辞确实存在让读者不明就里的问题。那么,王安石文中的“先王”所指的是谁呢?答案似乎可以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找到:

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余载,……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sup>[5]</sup>

从上文来看,“先王”是指“二帝、三王”,也就是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但从中还可以看出喊“举先王之政”的口号仅仅是为了不至于使天下人民惊骇和怨声载道罢了,并没有涉及“先王”的什么具体措施和主张。一个空洞的口号不能构成论证,也就难以有说服力。

再如,“壬人”,课下注为“善于巧言献媚、不行正道的人”。这个解释似乎是非常明确具体的,但具体到王安石的判断标准似乎就渺茫了。韩琦、富弼、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苏轼、苏洵、吕公著、韩维等进谏反对改革之人是“壬人”吗?吕惠卿、曾布、李定、邓绾等所谓的改革派是“壬人”吗?王安石的判断标准就是看这些人是否支持变法,支持变法者就不是“壬人”,而司马光的理解则恰好相反。这是违背论证语言要实现“意义一致性”的基本准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概念的含义决定着对论证的理解和判断,语词的不同解释会导致理解的差异,甚至误解。如果对关键概念没有清楚、一致的理解,会使论证走向歧途。总之,像“先王”“壬人”这类让双方理解会产生偏差的语词,几乎不具有支撑论证的价值。

论证必须建立在具体、明确的概念之上。在论证中,词语,要有具体所指;抽象,要有具体的对应;概括,要有具体的实例。具体是理解的前提,是交流的基础和认识的来源。王安石无意识地使用晦涩难懂、空洞无意义、令人捉摸不定或易产生误解的语词进行论证,

论证力度不会大,说服力不会强,难以令读者信服。

## 二、论证的技能:批驳应有针对性,力避自说自话,论证乏力

一般认为,《答》文在论证过程中采用了演绎推理法。第二段一开始就提出了大前提——“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也就是首先认定做事情“名”很重要,名正才能言顺,才能事成,接着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五个方面提出自己的小前提,为自己的变法正名,进而推理得出自己变法是合理的。这样的逻辑具有严密性,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王安石写作本文是为了驳斥司马光的观点,可没太顾及司马光的立论基础,有自说自话的嫌疑。

驳论文,可以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方法等,但前提是必须要弄清楚对方的立论基础是什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写驳论文“要挖好防卫的战壕,经过周密的思考,击中敌人的要害”。王安石在批驳时并没有重视对方观点的“要害”,造成自己驳斥对方论点缺少了针对性和目标性。

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与王介甫第二书》的立论基础。司马光两封书信的理论基础是: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固民是尽,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与王介甫书》)<sup>[6]</sup>

光虽未甚晓孟子,至于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与王介甫第二书》)<sup>[7]</sup>

由上可知,司马光主要从义利之辩的角度阐发自己的观点,主张重义轻利,甚至是舍利取义。而王安石在批驳司马光观点时完全忽视“义利之辩”这一立论基础,而是另起炉灶,从“名实之辩”出发进行先立后破的论证。这种方式是否可取呢?我们先来分析鲁迅的几篇经典驳论文看看:

篇名	对方观点	鲁迅观点	两种观点关系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矛盾关系
《拿来主义》	送去主义、送来主义	拿来主义	反对关系
《“友邦惊诧”论》	友邦人士,莫大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运用归谬法撕掉友邦文明的面具,揭批蒋政府论调的荒谬	矛盾关系

从鲁迅先生的这三篇驳论文来看,对方观点与己方观点构成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或者是互不相容的反对关系,也就是确定一个与对方论点完全相反的观点,论证才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答》文行文的气势和文章的战斗力不容小觑,以“名实之辩”对阵“义利之辩”也有可取之处,但“名实”与“义利”之间关系较为复杂,两者并不构成矛盾或反对关系,“重义”和“正名”不是全异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是全同关系,两者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故以“名实”驳斥“义利”的逻辑力量就显得有些不足。那么,王安石怎么写才更有辩驳的力度呢?有两种方法:

一是直击司马光义、利两者水火不容的错误观点,阐释义、利两者并存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二是运用归谬法,先承认司马光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的观点正确,再推理出这种观点会造成的可怕而荒谬的后果,从而推翻其观点。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举例和说理论证,并阐释变法之目的:表层在取利,让国家财政丰盈起来;深层在取义,让国家不再受西夏、契丹等的侵扰,如此百姓方可安居乐业。这时,两人的观点冲突,就不再是“义、利”与“名、实”的冲突,而是“小义”和“大义”的辨析判断了。

造成《答》文批驳针对性差、说服力低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想急切证明自己变法的合理性、正当性,而忽视了作为一篇驳论文、一封书信的交际功能。而作为有说服力的写作应该做到的是“集中讨论与对手就论题产生的分歧,而不是只关注个人观点”<sup>[8]</sup>。

## 三、思维者的品质:要公平和开放,不能只照见别人,照不见自己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王安石在《答》文中确实出现了批判性思维论证技能层面的失误,但这并不能否认他是中国古代文人中批判性思维意识比较突出的典型代表。《读史》中,他用“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等诗句展现了史书难以做到绝对客观,在读书时应该保持批判精神,善于分辨,切忌盲从的批判思维态度;《读孟尝君传》中,他质疑世人对孟尝君“能得士”的评价,通过对“士”这一概念的阐释,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方法,指出孟尝君只不过是一个“鸡鸣狗盗之雄耳”;《游褒禅山记》中,他从自己游览褒禅山的经历中,运用归纳推理法,推导出处理好“志”“力”“物”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做好一件事的真知灼见;同样的,《答司马谏议书》中对司马光的保守理念进行抨击,也体现了王安石的批判精神。

但王安石仅能利用批判性思维来捍卫自己的信念,抵制和反驳那些不同的观点和论证,是一个弱势批判性思维者。为什么这么说?批判性思维

是对思维展开的思维,不仅要对他人的思维和观点进行理性审视,更要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能够坚持用事实和理由来推理,愿意根据事实调整或改变自己观点,能够勇于发现和更正自我偏见和成见。

通读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与王介甫书》《与王介甫第二书》,其中不少文字陈述了客观事实。如“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sup>[9]</sup>,指出王安石只愿听赞美变法之词,无人敢让其听到非议变法的话语,这是基本属实的;“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辄州县,骚扰百姓者”<sup>[10]</sup>,指出变法队伍中存有侵犯州县官吏职权、骚扰百姓者,这也是事实;“李正言言青苗钱不便,诘责使之分析。吕司封传语祥符知县未散青苗钱,劾奏,乞行取勘”<sup>[11]</sup>,指出王安石对指责变法者、执行变法不力者严苛对待的情况,也是属实的……但王安石在《答》文中没有加以区分和辩证分析,更没有进行实证探究,就用“不为侵官”“不为生事”“不为征利”“不为拒谏”和“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等给予了全盘否定,甚至可以说,凡是反对变法的人的所有观点,无论正确与否,王安石全部反对,这是典型的“因人废言型诉诸人身谬误”,这种做法不符合批判性思维理性精神和品德的。“我们对自己思想的偏爱有可能妨碍我们发现自己思想中的缺失,也妨碍对他人洞见的领悟和借鉴。”<sup>[12]</sup>批判性思维者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能够冷静审视不同意见,应该刀刃向内,主动反省;即使没有反对者、批评者,也应该做一个对自己“吹毛求疵者”,搜寻反例,进行自我反驳,以避免片面和偏激。从这个角度看,司马光对王安石“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的评价倒是几分道理的。

批判性思维者不仅要理性,而且应该是温和的理性,辩驳时也应该是在一种有风度、有礼貌的和谐氛围中进行。说服力写作,尊重你的受众,不讽刺冒犯你的读者,应该是基本原则之一。“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一句中加点的词语是在评价谁呢?司马光会认为是在说自己。《答》文虽然是写给司马光的书信,但这类性质的书信不会有私密性可言,更大范围的读者会读到,对变法持异议的朝臣读后只会更加憎恶王安石,更加憎恶变法。变法要想顺利推行,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王安石写这封信的目的应该是说明自己变法的合理性,甚至能够说服司马光等反对者转变对变法的态度,可是其书信中的措辞明显是在“拉仇恨”。保守派队伍更为团结壮大,变法阻力在增加。这样的表达不仅没有起到说服的效果,反而让变

法更加举步维艰。

李之亮说:“王安石的文章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以自我为绝对主体的独立意识,用一种褒奖的意思来评价,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英雄气概’;用种贬损的意思来评价,那就是:此人过于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几乎达到了旁若无人的地步。”<sup>[13]</sup>结合《答》文来看,这种说法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最后,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系列中虽有不少观点值得肯定,但并不是说其文章不存在问题,同样需要进行批判性分析和理解;分析《答》文中王安石的论证失范与思维偏颇,更不能一味否定本文的价值。王安石能够从司马光四五千字的长文中敏锐地抓住其五点责难的实质,并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批驳,这种论证能力本身就是学生欠缺的,应该首先学习。另外,王安石在《答》文中体现出的“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的改革勇气和“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受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的进取精神,在“立德树人”方面的价值同样值得让学生深入学习。而且以上两点应该是对《答》文进行批判性阅读的前提和基础。毕竟进行批判的目的不在破坏,而在建设和重构。

### 参考文献:

- [1] 温儒敏,总主编.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必修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289.
- [2] 董毓.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148.
- [3][6][7][9][10][11] 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242,242,247,241,242,245.
- [4] 江永红.通鉴载道:司马光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208.
- [5][13] 王安石.王安石集[M].李之亮,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6-7,3.
- [8] 布鲁克·诺埃尔·摩尔,理查德·帕克.批判性思维[M].朱素梅,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65.
- [12] 文森特·鲁吉罗.超越感觉:批判性思考指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09.

**【作者简介】**宗学耀,山东省淄博市基础教育研究院(255000)。

**【原文出处】**《中学语文教学》(京),2023.6. 52~5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山东省教师教育研究一般课题“基于语文实践活动的高中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策略实施研究”(编号:2020JXY298)的研究成果。

https://www.rdfybk.com/